

牛津世界史丛书

郭小凌主编

牛津拜占庭史

[英]西里尔·曼戈 主编
陈志强 武鹏 译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牛津世界史丛书

郭小凌主编

牛津拜占庭史

[英] 西里尔·曼戈 主编

陈志强 武鹏 译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First Edition (978198140986)

By Cyril Mango

Copyrigh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The Oxford History of Byzantium,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2.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0—754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津拜占庭史 / (英) 曼戈主编; 陈志强等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9

(牛津世界史丛书)

ISBN 978-7-303-19344-8

I. ①牛… II. ①曼…②陈… III. ①拜占庭帝国—历史
IV. ①K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3116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NIUJIN BAIZHANTINGSHI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6.62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5.00 元

策划编辑: 刘松弢

责任编辑: 王艳平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本书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
(项目编号: 14ZDB061) 成果

作者名单

西里弗·弗斯(Clive Foss)，波士顿马萨诸塞大学历史学教授，《拜占庭和土耳其的萨尔迪斯》(*Byzantine and Turkish Sardis*)(1976)和《古代以后的以弗所》(*Ephesus after Antiquity*)(1979)的作者。

罗伯特·霍伊兰(*Robert Hoyland*)，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 Leverhulme 研究员，《从另一种视角观察伊斯兰教》(*Seeing Islam as Others Saw it*)(1997)和《青铜时代到伊斯兰教诞生时的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人》(*Arabia and the Arabs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Coming of Islam*)(2001)的作者。

伊丽莎白·杰弗里斯(*Elizabeth Jeffreys*)，牛津大学拜占庭史和现代希腊语言文学 Bywater and Sotheby 教授及埃克塞特学院研究员，《约翰·马拉拉斯研究》(*Studies in John Malalas*)(合作，1990)和《特洛伊战争》(*The War fo Troy*)(1996)及《狄吉尼斯·阿克里特》(*Digenis Akritis*)(1998)的作者。

帕特里夏·卡林-海特(*Patricia Karlin-Hayter*)，任教于伯明翰大学和贝尔法斯特大学，《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尤西米乌斯传》(*Vita Euthymii Patriarchae Constantinopolitani*)(1970)和《拜占庭政治史研究》(*Studies in Byzantine Political History*)(1981)的作者。

保罗·马格达利诺 Paul Magdalino，圣安德鲁斯大学拜占

庭史教授,《皇帝曼努埃尔·科穆宁一世的帝国》(*The Empire of Manuel I Komnenos*)(1993)和《中世纪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médiévale*)(1996)的作者。

西里尔·曼戈(Cyril Mango),牛津大学 Bywater and Sotheby 退休教授,《新罗马帝国》(*The Empire of New Rome*)(1980)、《4—7世纪君士坦丁堡城市的发展》(*Le Développement urbain de Constantinople, IV^e-VII^e siècles*)(1985)、《“告白者”塞奥发尼斯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1997)的作者。

玛利亚·芒德尔·曼戈(Marla Mundell Mango),牛津大学拜占庭考古和艺术高级讲师,圣约翰学院研究员,《早期拜占庭的银器:卡波·科拉翁及相关宝藏》(*Silver from Early Byzantium: The Kaper Koraon and Related Treasures*)(1986),《塞索宝藏(甲)》(*The Sevso Treasure, Part I*)(合作,1994)的作者。

斯蒂芬·W. 赖纳特(Stephen W. Reinert),拉特格斯大学拜占庭和早期土耳其研究助教,多篇文章的作者和《迈向希腊文化:纪念斯普拉斯·弗隆尼斯研究文集》(*To Hellenikon: Studies in Honor of Speros Vryonis*)(1994)的主编。

彼得·萨里斯(Peter Sarris),剑桥大学中世纪史高级讲师,三一学院研究员,《查士丁尼时代的经济和社会:牛津中世纪欧洲史,500—700》(*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Justinian: The Oxford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500—700*)的作者。

伊戈尔·舍甫琴科(Ihor Ševčenko),哈佛大学 Dumbarton Oaks 中心拜占庭史退休教授,《帕列奥列格王朝初期的拜占庭知识分子与政治》(*La Vie intellectuelle et politique à Byzance sous les premiers Paleologues*)(1962)和《书信和文化中所见拜

占庭与斯拉夫人》(*Byzantium and the Slavs in Letters and Culture*)(1991)的作者。

乔纳森·谢帕德 Jonathan Shepard, 剑桥大学俄罗斯史高级讲师,《拜占庭的外交》(*Byzantine Diplomacy*)(1992)的联合主编,《罗斯人的兴起(750—1200)》(*The Emergence of Rus, 750—1200*)(1996)的作者。

沃伦·特里高德 Warren Treadgold, 圣路易斯大学晚期古代和拜占庭史教授,《拜占庭及其军队》(*Byzantium and its Army*)(1995)和《拜占庭国家社会史》(*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1997)的作者。

致 谢

本总编对 Marlia Mundell Mango 策划本书图片，下列人士和机构提供与帮助获得每张照片或图纸表示感谢：

M. Achimastou-Potamianou (Athens), S. Assersohn (OUP), J. Balty (Brussels), L. Brubaker (Birmingham), St Catherine's Monastery, Mount Sinai, A. Ertuğ (Istanbul), A. Guillou (Paris), R. Hoyland (Oxford), C. Lightfoot (New York), J. McKenzie (Oxford), Ch. Pennas (Athens), Y. Petsopoulos (London), M. Piccirillo (Madaba), N. Pollard (Oxford), J. Raby (Oxford), L. Schachner (Oxford), I. Ševčenko (Cambridge, MA), J. Shepard (Oxford), R. R. R. Smith (Oxford), A.-M. Talbot 和 Dumbarton Oaks Library and Collection (Washington, DC), N. Thierry (Étampes), S. Tipping (OUP), L. Treadwell (Oxford)。全书索引由 Meg Davies 完成。

序 言

我想我不必重复拜占庭一直并继续被人们不适当地忽视了这样的话。这种情况直到百年前，甚至 50 年前还是如此：当然目前不再是这样了。孟德斯鸠和爱德华·吉本那些人对拜占庭的诋毁诟病在当代人中还有余毒，有些人还保持着某些维多利亚时代的敌意，但是总的来说，在 19 世纪末以前这种看法逐渐消除，对拜占庭的评价更为积极。尽管情况还不尽如人意，拜占庭被排斥在学术课程之外的现象还是得到了纠正。如今，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大学都讲授拜占庭研究课程；有 12 种以上国际学术期刊专门刊登拜占庭资料；相关专著的数量也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大量增加；国际会议、讨论会、圆桌会议、专题讨论会的数量难以计数，而拜占庭文物展览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新一届拜占庭研究国际会议（2001 年在巴黎举行）就有上千名出席者。

拜占庭帝国的昭雪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欧洲历史观念和审美倾向的发展中构成了一个有趣的篇章。曾经被视为只有堕落腐朽、阴谋诡计和邪恶丑陋的传说转变成为令人激动、丰富多彩的史诗；曾被吉本看作是迷信的东西变为精神性十足、富有灵气的东西；曾被嘲讽为呆滞僵化、毫无生气的拜占庭艺术在 20 世纪初变成了反对僵死的学院经典的精神资源。这些变化的发生是因为我们比前人拥有更多的资料吗？自 1850 年前后，我

们确实拥有更多关于拜占庭“物质文化”的知识，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出现于成文文献方面。实际上，如果有人认真梳理一下就会知道，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拜占庭文献早在 1850 年就被整理出来了。拜占庭帝国并没有发生变化，而是我们的研究态度发生了变化，毫无疑问将来还会变的。

拜占庭无须任何辩解，其在欧洲和近东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已经是确定的事实了；其文献（如果有人愿意把这个术语用来指称所有文本集成的话）虽然广泛，但是却遭受了比较严重的损失；其保存在岩石、绘画和其他媒介上的遗产遭到更严重的破坏，成为许多无法再生遗产的突出代表。以此为基础，就有可能将有关拜占庭成就的富有见识的结论与其他当代文明特别是中世纪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进行对比，这类对比工作至今还很少有人从事。

如今，倡导重新解释和质疑公认观点之风对拜占庭历史的影响比任何其他时期都要深刻。在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学术界也不再有一致的看法。因此，我并不想把我自己的观点或相互一致的看法强加给本书的各位作者。

西里尔·曼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从君士坦丁到伊拉克略的东罗马帝国(306—641)	29
第二章 城市与乡村的生活	99
第三章 新宗教与旧文化	131
第四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	169
第五章 生存斗争(641—780)	179
第六章 毁坏圣像运动	211
第七章 中期帝国(780—1204)	236
第八章 学术的复兴	288
第九章 传播福音：拜占庭的使命	312
第十章 分裂瓦解(1204—1453)	337
第十一章 帕列奥列格时代的学术	389
第十二章 朝向法兰克—希腊文化的发展趋势	404
编年大事记	424
参考书目	440
索 引	456

绪 论

1

拜占庭(Byzantion)这个名词的拉丁语形式为 Byzantium, 是一个位于色雷斯地区博斯普鲁斯海峡入海口的希腊殖民地的名字——这是一个自然风光极其秀丽, 同时兼具重要战略价值的地方。大约在建城 1000 年之后, 拜占庭被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选为皇帝的驻地 (324), 并将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新罗马 (Constantinopolis nova or altera Roma)。这种行为在当时并非没有先例: 君士坦丁伟大的先辈戴克里先皇帝 (Diocletian, 284—305 年在位) 就曾经把自己的宝座安置在附近的尼科米底亚城 (Nicomedia, 今日的伊兹米特), 并且致力于“使它与罗马难分伯仲”。但是, 与尼科米底亚和其他几个临时的首都很快失去了其地位不同, 君士坦丁堡取得了长久的成功, 这座“统治之城”延续了 11 个世纪, 这还不包括之后奥斯曼苏丹们 5 个世纪的统治史。

从历史的长期发展来说, 君士坦丁这一充满灵感的举动表面看起来是一次统治权的迁移 (*translatio imperii*), 即在一个新宗教的护佑下, 在一个新地方开启了一个新进程, 也就是一次革新。然而, 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样做并不一定是要与过去的传统一刀两断。新罗马包含了旧罗马的元素。甚至有传说说, 君士坦丁秘密地将特洛伊的守护神从罗马移出, 并将其埋于他

在君士坦丁堡竖立的那根巨大的斑岩石柱之下。顺便提一句，这根石柱历经沧桑，至今依然屹立不倒。安淑撒(Anthusa)其实就是罗马弗罗拉神(Flora)的复制品而已，君士坦丁堡就是献给这位神秘的命运女神的。

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们继续自视为合乎法统的罗马皇帝，正如他们的臣民自称罗马人(Romaioi)一样，尽管许久以后，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词的拉丁语读音。他们没有为自己寻找其他的祖先。我们任举一例，当11世纪的博学家米哈伊尔·普塞罗斯(Michael Psellos)为了指导他的学生——皇帝米哈伊尔七世(Michael VII)而编纂一部入门的史书时，是从罗慕路斯(Romulus)和勒莫(Remus)开始记述的。他寥寥数笔就带过了王政时代的诸王和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官们，接下来详细地记录了皇帝们的世系传承。这一谱系开始于君主政体的创立者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直到瓦西里二世(Basil II)和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VIII)为止。奥古斯都(Augustus)，而非君士坦丁，是其历史中的关键人物，因为他的统治时期恰好与我主上帝道成肉身的时间相吻合，这是当时普世历史中的核心事件。基督教和罗马的君主政体，实际上是同时产生的。

直到十字军时代，古罗马的外衣才被渐渐脱去。那个时候，东方的帝国和西欧逐渐被迫拥抱在一起，而双方却都不怀有任何爱意。在西欧人看来，君士坦丁堡的王国毫无疑问是个希腊人的国家，而且还是个分裂出去的政权。作为回应，一些希腊的知识分子则将他们自己与古希腊(Hellas)的荣光联系在了一起(见第十一章)。然而，“种族认同”在那个时代广受关注的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当时，导致裂痕产生的重大争议在于宗教——即是否顺从罗马教皇、圣灵如何临在(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炼狱、教士的独身生活、在圣餐仪式中使用发酵面饼还是无酵面饼等问题。正是它们导致希腊人和拉丁人彼此

分隔。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基督教世界才能在教皇的领导下，重新以罗马之名联合在一起。

约翰·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爵士在 14 世纪中叶依然可以使用“希腊皇帝”(the emperor of Grece)这一称呼，但是，这在文艺复兴时期更富学者气息的环境中却不那么恰当了。“希腊”此时特指古希腊或者地理上正被土耳其人占领着的希腊地区。已经于 1453 年灭亡的君士坦丁堡的王国需要一个独有的称谓，这就是“拜占庭的”(byzantinus)这个形容词产生的背景。这个词比“君士坦丁堡的”(Constantinopolitanus)更为简便，同时带有让人愉快的“古典”光环。现在，人们可以使用“拜占庭文献”(scriptores byzantini)、“拜占庭历史”(historia byzantina)和“拜占庭帝国”(imperium byzantinum)这些概念了，尽管由历史学家路易·库赞(Louis Cousin)撰写的最早一本关于拜占庭的大部头史书(1672—1674 年完成)依然被冠以《君士坦丁堡史》(*Histoire de Constantinople*)之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早一部在书名中使用“拜占庭”这一名称的英语作品是乔治·芬利(George Finlay)于 1853 年撰写的《从 716 年到 1057 年的拜占庭帝国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from 716 to 1057*)。在英语世界中，“拜占庭”(Byzantine)这个词用来形容一个帝国而非那座城市的现象要到 20 世纪时才变得普遍，而在法国、德国和俄国则要更早一些。

这样，当“拜占庭”这个概念不再带来不便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方便的术语。在合理的界定下，拜占庭必须被视为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世界东部的直接延续者，即罗马帝国在语言和文化上受到希腊影响的那个部分。作为一个延续的概念，它没有起始，尽管一些有象征意义的日期已经被用来当作其历史的开端：如戴克里先登基(284)、君士坦丁堡奠基(324)、君士坦丁堡落成典礼(330)、将基督教作为帝国唯一排他性的宗教(380)、

3

帝国被划分为东西两个部分(395)、西部帝国的灭亡(476),乃至利奥三世(Leo III)登基(716)等,其中后者目前依然被《剑桥中世纪史》(*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加以采用。对于这些日期,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然而,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很可能更应该归因于感觉,而非一种“客观的”、被假定当作历史分期基础的标准。对于我们来说,罗马是我们的文明之源,根据我们的定义,它属于古典世界的范畴。当我们凝视着和平祭坛(Ara Pacis)、图拉真圆柱(Trajan's column)上的浮雕,抑或马可·奥利略(Marcus Aurelius)骑马的雕像时,我们是在和罗马的精神进行交流。但是,当我们在拉文纳(Ravenna)圣维塔利教堂(San Vitale)里描绘查士丁尼(Justinian)的著名镶嵌画前沉思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所描绘的不再是一个自然主义风格的宗教仪式画像(敬奉一个圣杯),而是一个圣像。查士丁尼头顶光环,他和他的随员们正面对我们,身后则是金光灿灿的背景。我们没有即刻理解艺术家的意图,他表现的是一个向右侧行进的队列,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物虽以正面示人,却都踩在彼此的脚尖之上。在我们的眼中,圣维塔利教堂的查士丁尼看起来是一个纯正的拜占庭人;然而真正的查士丁尼,这个操着拉丁语、征服了意大利和北非的罗马法最伟大的编纂者,却将自己看作一个纯粹的罗马皇帝,他的后人也是如此。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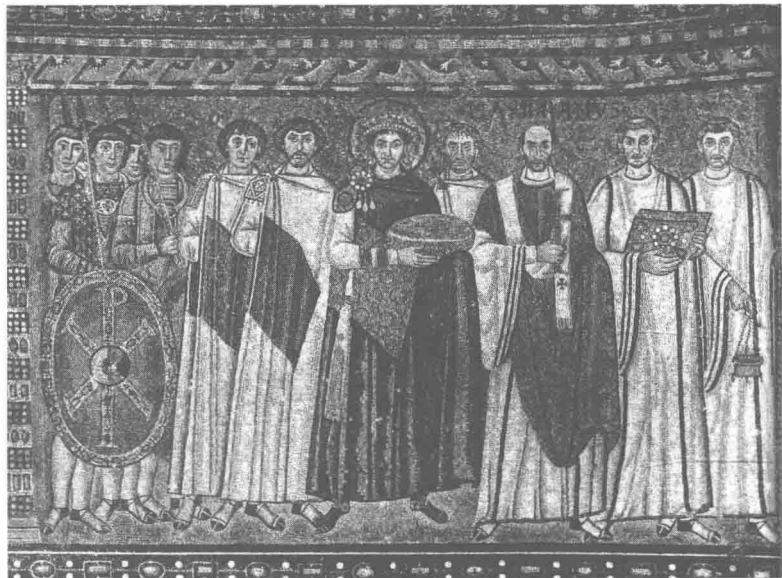
那么,我们要把分期线划在何处呢?如果我们能够不再徒劳地寻求一个从罗马到拜占庭转型的精确时间,而去寻找一个或几个更宽泛的、见证了深刻变革的时段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两个这样的时代。第一个可以被定位在4世纪,第二个则大约在575—650年。这两个时段的性质并不相同。第一次转变更多地发生在文化领域,而非政治领域,它与基督教被当作国家官方信仰联系在一起。这样说,并非排斥在这一时期发生



公元前9年罗马和平祭坛的浮雕。奥古斯都皇帝在一个宗教仪式中。他被拜占庭人认为是君主政体的创立者。

的其他更为有形的变化，如国家机器在行政、军事以及财政方面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财政方面的变革在戴克里先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得到发展，皇帝的主要驻地东移到了君士坦丁堡，以皇帝身边机构为基础的一个新精英阶层开始出现，等等。然而，如果从一个长时段予以审视，最引人注目的不是省区数量的增加，不是引入税收普查，也不是改革货币，而是将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帝国所有臣民，并压制那些异见者。

第二个时间段(*coupure*)则更为明显和令人伤痛。它的标志不仅仅是在巴尔干和近东地区丢失了广阔的国土，同时还包括城市生活的衰落。城市曾经是古代的一个主要特征（见第二章），此时许多城市从地图上被抹去；另一些城市规模显著缩小，沦为防卫要塞，或者被迁移到附近的山顶。曾经是省区政府支柱的城市精英们和那些文雅的文学一起消失了。生活变得乡村化和军事化了。



545 年的马赛克镶嵌画。奥古斯都皇帝的后辈，查士丁尼将一个圣餐碟敬奉给拉文纳的圣维塔利教堂。他站在马克西米安(Maximian)主教和两名助祭身前。画面上其他人的身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查士丁尼左侧留有胡须的男子有可能是贝利撒留(Belisarius)将军。

5 在我们提到的这两个时间段之间的时代，我们把它称作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这一概念的独特性仅仅在最近 50 年方才得到承认，并且变成学术上的一个热点问题。的确，古代晚期的时间界限有些模糊不清：一些学者将它的起点定在公元 200 年，另一些学者则将其终点延长至 1000 年。然而，比较常见的是 284—602 年的说法，这是琼斯(A. H. M. Jones)在其不朽的著作《晚期罗马帝国》(*Later Roman Empire*)中的观点。另一种得到承认的时间定位是 284—641 年，这种说法见于同样重要的名著《晚期罗马帝国列传》(*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这样一种界定很符合拜占庭研究的视角。

古代晚期涵盖了罗马人的整个世界，无论是拉丁的还是希